



金代名士
党怀英

研究

Jindaimingshidanghuaiyingyanjiu

聂立申 著

 吉林大学 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金代名士
党怀英

研究

聂立申 著

吉林大学出版社
JILIN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 / 聂立申著. --长春 : 吉林大学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 - 7 - 5601 - 9489 - 9

I. ①金… II. ①聂… III. ①党怀英 (1133 ~ 1210)
人物研究 IV. ①K827 = 4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301162 号

书 名：金代名士党怀英研究

作 者：聂立申 著

责任编辑：孙 群 责任校对：代景丽

吉林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开本：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张：21.25 字数：430 千字

ISBN 978 - 7 - 5601 - 9489 - 9

装帧设计：李 宁

吉林省吉财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2012 年 12 月 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定价：68.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社址：长春市明德路 501 号 邮编：130021

发行部电话：0431-89580026/28/29

网址：<http://www.jlup.com.cn>

E-mail：jlup@mail.jlu.edu.cn

| 目录 |

前言	(1)
第一章 党怀英研究的缘由、现状及方法	(1)
第一节 党怀英研究的缘由与现状	(1)
第二节 本书研究的史料和方法	(5)
第二章 党怀英籍贯、家世及生平考	(8)
第一节 党怀英籍贯考证	(8)
第二节 党怀英家世及生平考证	(14)
第三章 党怀英时代的金朝社会	(22)
第一节 金朝政治概况	(22)
第二节 金朝经济概述	(35)
第三节 金代文化的发展	(41)
第四章 党怀英求学与师事	(50)
第一节 党怀英山东就学	(50)
第二节 党怀英师事考释	(54)

第五章 党怀英的仕宦经历	(64)
第一节 大定初年党氏的入仕	(64)
第二节 大定中后期党氏的仕进	(77)
第三节 明昌、承安年间党氏的仕宦	(86)
第六章 党怀英致仕与归隐	(99)
第一节 党怀英致仕考释	(99)
第二节 党怀英归隐泰山	(107)
第七章 党怀英与泰山书院	(110)
第一节 宋初三先生与泰山书院	(110)
第二节 党怀英与泰山书院	(119)
第八章 党怀英与辛弃疾	(126)
第一节 党怀英与辛弃疾的师从考释	(126)
第二节 党怀英与辛弃疾绝著分手原因探析	(135)
第三节 党怀英与辛弃疾的异同	(145)
第九章 党怀英与全真七子马钰	(151)
第一节 全真道教的兴起与传播	(151)
第二节 党怀英与马钰关系考	(158)
第十章 党怀英与赵沨	(169)
第一节 赵沨生平与地位考	(169)
第二节 党怀英与赵沨关系考释	(176)
第十一章 党怀英文词创作探析	(181)
第一节 金代文词的溯源及嬗变	(181)

第二节 宋、金时代社会文化对党怀英的影响	(186)
第三节 党怀英文词探析	(190)
第十二章 党怀英诗歌作品赏析	(201)
第一节 金代诗歌的溯源及嬗变	(201)
第二节 党怀英诗歌赏析	(209)
第十三章 党怀英书法作品赏析	(220)
第一节 党怀英书法作品稽考	(220)
第二节 党怀英书法作品赏析	(226)
第十四章 党怀英的思想探究	(235)
第一节 党怀英著述作品考释	(235)
第二节 党怀英思想探究	(237)
第十五章 党怀英的泰山情怀	(247)
第一节 党怀英的泰山情结	(247)
第二节 党怀英泰山名人文化研究	(252)
第十六章 党怀英的历史地位	(258)
第一节 党怀英的历史地位	(258)
第二节 党怀英与中国传统文化漫谈	(268)
第十七章 党怀英诗词文辑录	(279)
第一节 党怀英诗词辑录	(279)
第二节 党怀英碑文、石刻作品辑录	(288)
附录一：资料选编	(302)
附录二：金朝世系表	(311)

附录三：宋朝世系表	(313)
附录四：党怀英简谱	(317)
参考文献	(321)
后记	(329)

第一章 党怀英研究的缘由、现状及方法

时下社会有一种很流行的说法，那就是“让过去的过去吧”。或许这话本身并没有错，但是否意味着现今的人们完全可以抛却历史，只看未来呢？其实不然。李学勤先生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们每一个人，不但要认识现在，还要认识过去，这其实是人类自身发展的需要。”^① 所以如何认真、客观地对待过去，仍是当今社会人们亟需回答并解决的问题，因这不仅关系到人们价值观和世界观的形成，更关系到如何对待历史这一重大态度。

宋、金、元时期，泰山及附近地区文化昌达，人才辈出，曾涌现出一大批贤士文豪，如梁颢、梁固、石介、党怀英、赵沨、赵秉文、高文秀、王桢等。他们为寻求天下大治、强国富民之道，要么开宗立派，播扬学理，要么独标新帜，建构自己的思想理论体系。这些人物不仅以“文”著名于世，而且大多有着不凡的仕宦经历，他们与当时社会的政治、文化多有关联，很值得作深入研究。

第一节 党怀英研究的缘由与现状

一、党怀英研究的缘由

1995年4月，笔者受地方旅游部门邀请，曾编写一套关于泰山历史文化之谜的旅游小册子，在搜集材料的过程中，在《泰安县志》上第一次接触到党怀英这位人物。鉴于此人在宋、金时期有较大影响，可历史文献记载较少，甚有细考之必要，遂产生了日后进一步研究的兴趣。但当时鉴于个人学识水平浅陋及文献资料的匮乏，迟迟难以下笔。此后更是由于人事倥偬，长期搁置了这个题目。而人事的变动，也使当时编写的一套泰山文化之谜的小册子未能按时出版，六、七万字的书稿长期困于阁楼一隅。

后在山东大学读研期间，重为冯妇，再一次拾起这个题目，并决定利用这一难得机遇细细考证，遂才有了自己的硕士论文《金朝党怀英研究》。虽当时称之为研究，但还是有滥竽充数之嫌，对很多问题未能交代清楚。2007年，全国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开始。恰逢其会，我院蒋铁生教授与泰山区文体局签订了普查协议，按照此协议，泰山区所有不可移动文物的普查工作由我们完成。在2008至

^①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2版，第21页。

2010年的文物田野普查过程中，在许多地方发现了党怀英的碑刻史料，尤其是在今日泰山区邱家店镇旧县村北，还发现了宋、金时期著名的佛教寺院旧址——天封寺。借用白寿彝老先生的一句话说，“有了新材料，就开辟了创新思路”，^①于是决定重新研究党怀英。当然，重新研究党氏更有以下几层涵义：

首先，作为“五岳之尊”的泰山，一直被视为中华民族的神山，有着极其深厚的文化沉淀。她不仅是泰安地区悠久历史文化的形象标志，更是中华民族文明发展历史悠远的直观反映，在国人心中有着不可替代的地位。正如学者所说，“长城、运河是伟大中华民族的象征，泰山何尝不是伟大中华民族历史的见证”。^②“像泰山那样历史文化延续之长，宗教信仰影响之大，乃至成为一个民族传统文化的象征，实不多见”。^③“泰山作为中华民族朝拜的神圣大山，从原始部落开始，在整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过程中，都起着积极的影响和作用，这是世界上其他任何一座大山都无法比拟的”。^④所以泰山文化的研究，一直受到学术界的重视，而泰安地区的历史文化名人，作为广泛意义上的泰山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自然也应受到学界重视。然笔者发现，目前学界对泰安地区历史名人的研究，成果相对较少。今虽有一些撰述，但对泰安党姓，尤其是金朝党怀英的系统研究，成果却无。就现有成果而言，也是大多停留在史料整理、传说收集的初步研究层次上。总体来看，学界对于党怀英的研究还处于比较薄弱的阶段，这与党怀英在金朝政治、文化界有着重要地位不相称，也与党怀英在地方历史文化中的显著地位不相符，所以理应对他做出更为深入的研究。这正是选择该人物进行研究的直接原因。

其次，对党怀英的深入研究，有着一定的现实意义。众所周知，泰安是一座历史文化名城，有丰厚的文化积淀。但她尽管号称“五岳独尊”，为天下名山之首，其实却是以人文景观胜出而非自然景观。泰山的特色与本质，也就在于它有丰富而深厚的历史文化蕴涵。不可否认，目前学界对泰山历史文化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相对集中在狭义的泰山文化研究上，而同样丰厚的当地历史人物及相关文化的研究，却十分薄弱。所以开展此项研究，不仅有利于加强本地区历史文化研究的力度，丰富泰安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而且更有利于促进地方旅游业及相关产业经济的发展，加大对外的吸引力、注意力。所以加强对地方历史人物文化的研究，是丰富泰山文化内涵的现实需要所在。

当然，泰山文化要有新内容、新发展，也必须加大对本地历史文化的研究力度。因为只有在充分挖掘本地文化的内涵下，才能进一步丰富本地历史文化的内容，故这是地方发展的需要，是每一个地方历史工作者的责任与义务。

①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91页。

② 苏秉琦：《加强泰山“大文物”的研究》，《泰山研究论丛》（1）青岛海洋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22页。

③ 刘慧：《泰山庙会》，山东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第3页。

④ 汤贵仁、刘慧等编：《泰山文献集成》1卷（序），泰山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1页。

再次，泰安是笔者生斯长斯的家乡，研究泰安地区的历史文化，不仅有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而且对地方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进而形成富有特色的地方史研究成果，也是笔者长期以来的夙愿，所以今选定以党怀英为研究对象，正是这一研究计划中的一部分。

总之，通过对党怀英人生仕宦经历及思想、人生态度、人际交往关系和价值观的研究与充分发掘，相信会对今日的社会和读者有所启发。因为不同时代的人物当他面对泰山、人生而抒发的情怀，留下的题铭、咏颂的诗文、演绎的故事，毕竟会流露出不同时代的不同政治抱负、人生命途和文化倾向，而从某些侧面反映出时代的政治风云和民族命运，无疑会有益于我们今天加深对古代社会及古人的认识。这正如学者所说，“认识中国古代，不仅对中国有益，而且对整个人类有益。因为人类都是有过去的历史，人类的每一秒钟，每一分钟都是会变成过去的。我们对人类的过去的发展规律缺乏认识，就很难把握住今天、明天。而要对人类的过去有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也就有必要研究中国的古代”，“而在时代大潮冲击下的今天，如何认识古代中国，这是当今中国社会各方面的人们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如何对待悠久、辉煌的古代文明？如何看待历史绵远的传统文化？中国人对古代的认识问题，是一个牵涉到整个人生、世界的看法的最根本的问题。对全体中国人来说，对古代的认识实际上是与一个中国人的人生观、世界观密切相关的问题，它是关系到中国人对于自身价值标准的基本准则认同的大问题”。^①

二、党怀英相关研究成果的回顾

与党怀英在金朝政治、文化地位以及其他名人相比，目前学界对他整体的研究明显滞后，学术研究成果并不多。学界较早涉及党怀英研究的，是近代梁启超先生。他在《辛稼轩先生年谱》^②一文里，就重点考证过辛弃疾、党怀英是否师事蔡松年、二人同学一事。后来陈思先生在《稼轩先生年谱》^③一著中也谈到了党怀英，并断然否定党、辛二人师事蔡松年之事。及至现在，国、内外关于党怀英的研究著作并未出现，论文也仅有数十篇。其中涉及党怀英较有影响的著作、论文有：

1979年9月，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邓广铭先生的《辛弃疾年谱》；1994年2月，十月文艺出版社出版的王德宽等著《中国文学答问总汇》中的《党怀英是怎样一位诗人》；1995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刘瑞轩、管斌著《山东古代书法论》中的《擅长篆隶的党怀英》；1993年，第1期《求索》，马积高先生的《论党怀英与辛弃疾》；1998年，第1期《大同高专学报》12卷，马志强等人的《党怀英及其诗文书法略论》；1999年，第1期《文教资料》，王庆生先生的《党

①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2版，第64页。

② 梁启超：《辛稼轩先生年谱》，载《饮冰室合集》，民国17年（1928年）影印本。

③ 陈思：《稼轩先生年谱》，《辽海丛书》第六册，民国22年（1933年）辽海书社铅印本。

怀英生平仕历考述》；2000年，第2期《社会科学战线》，周惠泉的《金代文学论》；2002年，第11期《兴大历史学报》（台中），王明荪的《金代士人之历史思想》；2003年，第4期《雁北师范学院学报》，马晋宜、杜成辉的《党怀英诗文书法地位略论》；2007年，第6期《绥化学院学报》，李淑岩的《党怀英的诗作品第及成因探析》；2010年，第3期《集宁师专学报》，王花的《论金代诗人党怀英对陶渊明的接受》；2011年，第1期《书法赏评》，王守民的《党怀英书法及其篆书艺术之创新》。

除上述论文外，从2008年至2011年期间，著者也先后发表过几篇关于党怀英的文章，如2008年10月的《党怀英籍贯、家世及生平略考》；2009年12月的《金朝名士党怀英的泰山情怀》；2011年12月的《金朝党怀英泰山行迹考述》等。

当然在这些论文中，尤以王庆生先生所作最具代表性。在该文中，王先生分四部分较全面地考证了党怀英的籍贯、生平及仕宦经历和地位，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参考。

此外，涉及党怀英研究的著作、论文还有：商务印书馆于1934年出版的苏雪林、吴梅的《辽金元文学》、《辽金元文学史》；山东教育出版社1983年7月出版的《山东历代作家传略》；山东教育出版社1984年出版的吕慧鹃、刘波等著的《中国历代著名文学家评传》卷三（宋、金）；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周惠泉、米治国的《辽金文学作品选》；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山东友谊出版社1990年出版的李伯齐、车吉心主编的《齐鲁闻人》；台湾广雅文化出版社1993年出版的詹杭伦的《金代文学史》；山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的赵志坚、张洪英的《山东通史》（宋元卷）；山东友谊出版社1999年12月出版的袁爱国的《泰山名人文化》；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出版的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2001年山东省地图出版社出版的泰安地方史志办公室编《泰安三千年历史人物传》；中华书局出版社2004年7月出版的安作璋、王志民主编的《齐鲁文化通史》；2005年，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古籍影印编辑室编的《辽金元名人年谱》（全三册）；2005年1月，凤凰出版社出版的王庆生的《金代文学家年谱》等。

相关论文有：1995年第3期《社会科学战线》周惠泉的《论金人的金代文学批评》；1997年第3期《徐州师范大学学报》（人社版）王庆生的《辛弃疾师事蔡松年说平质》；1999年第5期《泰安师专学报》赵山林的《南北融合与金代诗歌的发展》；2000年第2期《江苏教育学院学报》王锡九的《论大定明昌时期的七言古诗》；2002年第4期《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程继红的《辛弃疾师承述考》等。

国外涉及的相关研究有：美国学者陈学霖先生1962年10月31日的《〈归潜志〉与〈金史〉》，《大陆杂志》二十五卷第8期；日本学者外山军治先生1936年12月的《大金吊伐录》，《东洋史研究》二卷2号；藤枝晃先生1948年5月25日

的《金朝的实录》，《东洋史研究》十卷2号；梅津幸子1981年的《元遗山的中州集》，《九州中国学报》23号等。虽然上述著作及论文，对党怀英某些事迹也曾进行了较深入研究，并提出一些独到见解，但均非全面研究之作。如对党怀英思想、特点、文诗词创作概况及与辛弃疾、赵沨、马钰等人的关系等许多重大问题，不但没有涉及，更无全面深入的系统研究，从而使我们无法获得更多、更全面的对党怀英的认识，所以加大对党怀英的研究就尤为必要。

第二节 本书研究的史料和方法

我国古文学家姚鼐曾说，“论学问之事，有三端焉。曰：义理也，考证也，文章也”。侯外庐老先生也说过，“历史研究……必须有大无畏的科学勇气，克服一切艰难险阻，齐心协力，唯此，才能把我国历史科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文汇报》1980年6月5日）。对于党怀英的研究，应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和方法，著者感觉甚为困难。因为若是从纯学术角度研究，担心个人由于水平、学识所限，达不到学术著作研究的水准，乃至出现学界常戏称的史学作品只有三个人阅读（作者、编辑和排版工人）的现象，以致造成一种巨大的社会资源浪费，从而误人误己；但若以科普形式出现，受制于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更觉无从下手。俗话说“丑媳妇难免见公婆”，现今只好以四不像的形式书写，以供确实对宋、金朝历史感兴趣的学人，有雅兴去仔细品味一番，以不至于造成资源的浪费。观之著者此时心态，诚如学者所言：“无可讳言的，写人最不容易，写人最生是非，所以在我计划写这本书的当初，担心自己不够小心，朋友们也担心我会不够小心……可是在执笔之后，我的心情开朗得好像是淡云清风，一切都是凭借着一笔在手时的天地良心”。^①

当然作为一个小人物，笔者实无多大力量会造成什么影响。但毕竟自己是一名教育者，从事专业学科教育与研究是基本的职业工作。说得具体一些，这不仅是一种谋生的手段，更是职责所在。所以我时常兢兢业业，认真对待，不管有多大建树，都一直将探索历史视为自己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当然作为一名教师，也希望教给自己学生一些新的东西，以免误人子弟。

古人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方法作为人们从事任何事业并取得成功所不可缺少的手段，是人们完成任务、达到某种目的的必备工具。没有一套科学、有效的方法，任何事情都可能难以取得圆满成功。所以对于历史学研究过程中，采用什么样的史学方法进行行之有效的研究，就显得非常重要。当然采用什

^① 孔宪铎：《我的科大十年》（前言），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出版，2002年4月版，第4页。

什么样的史学方法，学界更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如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李大钊先生就认为：“一种学问的研究法，是说明怎样去研究那种学问对象的性质、形式、理法的方法……历史研究法，是说明历史学所研究的材料都是些什么？……怎样去就史的事实，一一加以考证，予以确定？怎样去考察事实相互间的因果，而说明之、解释之，明其所以然的道理？”^①而对此，我国知名学者李学勤先生亦曾说，“把文献研究和考古研究结合起来……充分运用这样的方法，必将能开拓出古代历史、文化研究的新局面，对整个中国古代文明做出重新估价。王国维、郭沫若先生等在重建古史中作出的杰出贡献，也正在于此。”^②

在历史学的研究中，尽管研究方法众多，但著者以为历史的比较研究应是我们高度重视的一种方法论。关于此种方法，印度学者德·恰巴迪亚那在《印度哲学》中说，“历史的比较常常投射出非常有意义的光芒，它会照亮我们理解中的幽暗角落”。周谷城先生在《中外历史的比较研究》一文中也说，“比较研究，即经常拿彼此不同的东西对照看得意思，这样做，可以使我们易于看出一些不应有的偏见。”余英时先生更认为，“在中国史研究中，参照其他异质文明的历史经验，这是极其健康的开放态度，可以避免掉进自我封闭的陷阱。所以我强调比较观点的重要性。”^③本书在具体研究中，尝试运用上述诸法，用以解读金朝党怀英，以便能够有所收获。

本书所凭借的研究材料，首先是大量的古代史志文集，如《金史》、《宋史》、《中州集》、《中州乐府》、《大金国志》、《金史记事本末》、《元史》、《泰山志》、《岱史》、《岱志》、《岱览》、《舆地广记》、《滏水文集》、《泰安县志》等。

其次，分散于各地的党怀英所作的碑文、石刻、诗词以及关于他的民间传说，也是本书所注意涉猎的极为重要的资料。王明柯先生说过：“真实的历史，不应只是‘典范历史’的声音，也不只是某一种‘边缘历史’的声音；真实的历史是荷塘里所有青蛙的和鸣”。^④郭志坤先生在《中国宣传史》（先秦卷）一著中也曾说，“口头宣传，就是到近现代也还是宣传的重要手段。在书写条件差的古代更是这样了。当时知识和思想的传播方式，一面靠口耳相传，一面靠观察模仿。歌谣、谚语、传说、故事、神话等，常常用口头传述作为宣传”，所以泰安一地众多石刻和民间人士的陈述，亦是本书注意搜寻探访的重要信息资源。

众所周知，中国古代石刻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中的一枝奇葩，是中华民族历史文化悠久的见证。几千年来泰山之所以成为“五岳独尊”，成为中华民族的精

^① 李大钊：《史学要论》引《李大钊史学论集》，河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25页。

^② 李学勤、郭志坤：《中国古史寻证》，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2年5月版，第42页。

^③ 余英时著、沈志佳编《中国知识人之史的考察》（序），《余英时文集》（第4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4月版，第2页。

^④ 王明柯：《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历史心性》，《历史研究》，2001年，第5期。

神支柱，其文化的内涵和历史价值主要就是体现在这些石刻上，所以泰山石刻是其突出的代表。2001年6月25日，泰山石刻就作为北齐至唐时期文物，被国务院批准列入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泰山作为世界自然与文化的双重遗产，就因有着大量的具有极高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的人文遗存石刻，而正是这些遗存石刻携带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从不同方面表现了中国古代劳动人民的高度智慧、技巧和名人灿烂的文化，才更体现了祖国历史的悠久与民族的伟大。如今在泰山辖区内（主要是指泰山上），现存的历代石刻就有1687处，此外，灵岩寺一带还有365处，徂徕山有56处，四门塔有471处等，这些数量多、种类全，内容广泛、字体多样、规模不一的石刻，可以说是研究中华民族历史的宝贵资料与精神财富。

事实上，石刻文献对史学研究的价值早在宋代就已引起学者密切关注。例如，赵明诚在《金石录序》中论称：“若夫岁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刻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盖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无失，而刻石当时所立，可信无疑。”近人陆和九在《中国金石学》中也指出：“欲考历代种族之区别，疆域之开拓，社会之习尚，变化之变迁，宗教之流传，均宜取资金石为佐证。”自现代学术“二重证据法”、“三重证据法”提出和今史料学的拓展，石刻的史料价值也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作为泰山石刻杰出的代表，金代党怀英所撰作及篆额的《大金重修东岳庙记》、《重修天封寺记》、《谷山寺记》、《十方灵岩寺记》等系列碑刻石文，自然是本书重点整理与考证的对象。

再次，现当代学者的相关研究论著、论文和各种报道及考古报告成果等，也是本书直接借鉴和吸收的对象。另外，网络上一些关于党姓及党怀英的信息，也是需要借鉴和参考的内容。

以前总认为隔行如隔山，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更是“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但随着近年来历史学科的发展，尤其是在今日历史研究中不断地吸收其它学科理论、研究方法下，使自己先前狭隘的认识有所改进。所以在该人物研究中，著者还是尽可能地在充分利用历史文献学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外，结合相关历史知识，以哲学、史料学、民族学、文化学、美术学、统计学等其它相关理论为指导，结合历代职官典章制度、历史人物评价，采用文献与实物、分类比较与综合评析相结合的诸多历史研究方法，梳理、考证党怀英的籍贯、家世、生平及仕宦经历，并在此基础上着重分析其思想及文诗词的特点、历史地位等相关问题，希冀在充分吸收、利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力争有所突破和创新。

第二章 党怀英籍贯、家世及生平考

党怀英（公元1133—1210年），字世杰，号竹溪，金朝奉符南城人。生于金太宗天会十一年（南宋绍兴三年），卒于大安二年（南宋嘉定三年）。由于年代久远，记载疏漏、有误，加之文献匮乏，学界对其籍贯、家世和生平有较大歧见，本章拟就上述问题做一考述，以飨读者。

第一节 党怀英籍贯考证

党怀英作为终金一代出色的文学艺术家和官员，关于他的籍贯，历来史家纷争不一。目前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即冯翊、马邑和奉符说。

其一，冯翊说。明人宋焘《泰山纪事》、清道光年版的《泰安县志》及今人邓绍基、杨镰主编的《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①、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②、周惠泉《金代文学论》^③等文献，均载党怀英为冯翊人。如《泰山纪事·人物志略》载：

“党怀英，字世杰，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④

《泰安县志》亦曰：

“党怀英，字世杰，父纯睦，冯翊人，仕为泰安军录事参军，因家焉”。^⑤

持此论者的主要依据是《金史·文艺上》卷一百二十五《党怀英传》（下简称《本传》）中的说法：

“党怀英，字世杰，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冯翊人。父纯睦，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因家焉。”^⑥

对此，金人元好问《中州集》卷三《党承旨怀英小传》（下简称《小

^① 邓绍基、杨镰主编《中国文学家大辞典》（辽、金、元卷），中华书局，2006年5月版，第282页。

^② 臧励和等编《中国人名大辞典》，上海书店印行，1980年11月版，第732页。

^③ 周惠泉：《金代文学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第101页。

^④ 【明】宋焘著、夏忠梅点校：《泰山纪事》，泰山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321页。

^⑤ 【清】徐宗干编：《泰安县志》卷9《志人物》，道光八年版。

^⑥ 【元】脱脱：《金史》，中华书局出版，1983年11月2版，第2726页。

传》)也曾有类似记载:

“父纯睦自冯翊来，以从仕郎为泰安军录事参军。卒官。妻子不能归，遂为奉符人。”^①

后世史家更是从党怀英所作《题张维中华山图》一诗“苺珠散遗胄，我姓出冯翊。空闻华山名，未始见颜色”中，肯定他祖籍为冯翊的说法。冯翊，查《金史》卷二十六《地理下》，其属“京兆府路同州，乃宋冯翊郡定国军节度，治冯翊”。经考证，即今陕西省大荔县。

陕西省楹联学会会员，中国诗书画研究会研究员，渭南市大荔县书协会员杨得胜先生^②，在他一首《同州赋》称颂家乡名人时就高度赞扬党怀英。赋曰：

“三辅重镇，同州大荔。神龟形体，天造世稀，北迤饗山，南临洛渭，黄河东绕，西护京畿。居要塞而辖十县，守东隅以防寇夷。物华天宝，神龟显灵之地；人杰地灵，隋帝诞生之居。同州列班，俊采星驰，白乐天沙苑读卷，杜工部诗赞沙苑，陆放翁曾游绕益寺，党怀英辅弼金朝为官……盛世家园万民乐。”

其二，马邑说。雍正《山西通志》卷六十五《科目》记载“大定十年进士”条，光绪《山西通志》卷十五《贡举谱二党怀英》条^③，就有关于党怀英籍贯他说的记载。如载曰：

“党怀英，马邑人，徙奉符。”

“党怀英，朔州人，宋太尉进裔孙，徙奉符。大定十年，以解魁擢甲科翰林学士承旨。”

此即认为党怀英是马邑人，与前说不同。上述文献，亦成为后人认为党怀英是马邑人的重要证据。此说尽管不被后人所看重，但其实际大有可考之余地，而且笔者亦看重此说。一是查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宇文懋昭《大金国志》等文献知，马邑，县名，为唐开元五年析善阳置，治大同军城。北宋初为朔州地，后为辽控制，属西京道；金时属西京路朔州，即今山西省朔州市。既然山西本地文献一再陈述强调党氏为朔州人，那么此说绝不会空穴来风；二是据《金史·党怀英本传》载：“党怀英……故宋太尉进十一代孙。”又检《宋史·党进传》，党进乃为马邑人，所以史家遂有怀英为马邑人的说法并不为过。对此，王庆生先生曾评论说：“检《宋史·党进传》，进为马邑人，故《山西通志》有此一说，亦不舛误”。^④

^① 【金】元好问：《中州集》卷3（丙集），中华书局出版，1962年4月2版，第88页。

^② 杨得胜，男，67岁，陕西大荔人，大荔县楹联学会会员。

^③ 《山西通志》雍正、光绪版，中华书局出版，1990年11月版，第1268页、1592页。

^④ 王庆生：《党怀英生平仕历考述》，《文教资料》，1999年第1期，第70页。

其三，奉符说。金人刘祁《归潜志》、宋人宇文懋昭《大金国志》、元人王恽《玉堂嘉话》、明代《泰山志》及一些今人研究著作如《全辽金文》、《中国文学史》、《山东通史》、《山东历史人物辞典》、《齐鲁文化通史》、《泰山名人文化》、《齐鲁闻人》、《辽金元诗选评》等，均认定党怀英为奉符（今泰安）人。如《大金国志》卷二十九记载说：

“党怀英，字世杰，奉符人。在孕时，母梦道士吴筠来托宿。及怀英生，仪观秀整，如神仙。少颖悟，日授千余言。放浪山水间，诗酒自娱。簞瓢屡空，晏如也。大定十年进士甲科，调成阳军事判官，累官至翰林学士承旨，致仕。大安三年九月终，是夕有大星陨于所居之堂，众惊视之，而公已逝矣。谥文献。礼部赵公秉文作墓志云：‘公之文似欧公，不为尖新奇险之语，诗似陶、谢，奄有魏晋。篆籀入神，李阳冰之后一人而矣。’^①

《归潜志》卷八亦记载：“奉符人党承旨怀英，辛尚书弃疾，俱山东人，少同舍属。”^②《泰山志》卷四《人物》曰：“党怀英，字世杰，泰山人。父纯睦……仕为泰安军录事参军，因家焉”。^③《全辽金文》“党怀英文”条也载：“党怀英，祖籍同州冯翊，随父宦居奉符，随占籍焉”。^④其中在“赵秉文”条的《中大夫翰林学士承旨文献党公神道碑》（以下简称《承旨党公碑》）又记载说：“公讳怀英，字世杰，泰安州奉符人，十一世祖宋太尉进”。^⑤

今人安作璋先生的《山东通史》“文苑篇”曰：“党怀英，字世杰，号竹溪，泰安州奉符（今泰安）人，金朝中期文字宗主。”^⑥而丁文方、赵呈元主编的《山东历史人物辞典》“党怀英”条也载说，“党怀英，金国文臣。字世杰，号竹溪。泰安人”。^⑦

检索宋人欧阳忞《舆地广记》、明人汪子卿《泰山志》、清人聂剑光《泰山道里记》等文献知，古奉符、泰安州、泰安军、泰安县的设置变化概况。

“（奉符）本汉博县，属泰山郡。后汉、晋因之，后魏为郡之治。北齐时改郡为东平。隋开皇初郡废。十六年改县为汶阳，寻改为博城，属鲁郡。唐武德五年置东泰州，正（应为贞）观元年州废，属兗州，乾封元年更名为乾封。皇朝大中祥符元年改为奉符。汉奉高县，为泰山郡治……隋开皇六年，改县为岱山，大业初省入博城。”

“州在周春秋时为鲁地。后属齐，为博邑。秦为奉高、博二县，属齐郡。汉

^① 【宋】宇文懋昭：《大金国志》（下）卷29，中华书局出版，1986年7月版，第419页。

^② 【金】刘祁撰、崔文印点校：《归潜志》卷8，中华书局，1983年6月版，第66页。

^③ 【明】汪子卿著、陈伟军点校：《泰山志》卷4，泰山出版社，2005年5月版，第224页。

^④ 阎凤梧主编：《全辽金文》卷中，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5月版，第1497页。

^⑤ 阎凤梧主编：前引，第2151页。

^⑥ 安作璋主编：《山东通史》（宋金元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12月版，第632页。

^⑦ 丁文方、赵呈元主编：《山东历史人物辞典》，山东人民出版社，1990年10月版，第298页。